

## 历史学视角：对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考

张建华

**内容提要：**打破学科界限，建立公共的学术平台——俄罗斯学已成为国内俄罗斯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和政治等学科学者共识。但是，中国俄罗斯学是一个尚未建立“规范学科”和“范式”的新兴学科，它的“学术共同体”也尚处于集结之中。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经验应该成为中国俄罗斯学建立最深厚的本土资源。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学，中国史学传统，学科范式，学术共同体

### 一、新学科建设的使命意识

如果从1708年清政府理藩院设俄文馆算起，中国的俄语教学大约走过了三个世纪的历史。而如果从被视为中国最早系统研究俄罗斯的著作、即何秋涛刊印于1860年的《朔方备乘》算起<sup>①</sup>，中国对俄罗斯的研究也有了近一个半世纪历史。但是，遗憾的是，自始至终，中国的俄语研究（包括文学、翻译和后来才有的国情学和教学法）与俄罗斯研究（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艺术和文化等）就走着两条似乎永远无法相交的“车不同轨”“路不相谋”的道路，走着一条“学”“研”脱节的奇异道路。仅以我极为熟悉的历史学界和比较熟悉的俄语学界为例，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理解和轻视的倾向。

如果将俄罗斯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走过的路与中国做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走着一条“学”“研”紧密结合的清晰道路。1715年第一届东正教传教士团到达北京，它即担负着双重使命：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1741年，东正教传教士团的留学生伊拉里昂·罗索欣应聘俄国科学院的设立汉语、满语翻译和研究职位，它不仅标志着俄国汉学走出了“传教士汉学”阶段，从此走上了“专业汉学”阶段，而且再度印证了俄国汉学“学”“研”结合的特点。而1837年喀山大学设立汉语教研室和1855年彼得堡大学设立东方系，不过再度强化了俄国汉学的上述特点。

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完整的“苏联学”（Sovietology，区别于Russology（“俄罗斯学”）），但是它具有较强的“政府性”和“目的性”的特点，直至80年代中期，在美国学术界两极格界稳定论占主体，对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缺少研究和预见。因此当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学术界开始反思它的失误，为什么没有成功地预见到苏联解体？大讨论后的结论是，以往的“苏联学”研究偏重于苏联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而忽视了对苏联民族、文化和宗教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加上过强的“政府性”和“目的性”的作用，使得美国的“苏联学”界对苏联演变和剧变反应迟钝，并且屡犯判断的错误。于是，在冷战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由原来单纯的“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转向综合的“国际问题”（international study）研究。

<sup>①</sup>此前有清代名臣张鹏翮（1649—1725年）的《漠北日记》（一名《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图理琛（1667-1740年）的《异域录》、方式济（1676-1717年）的《龙沙纪略》、松筠（1752或1754-1835年）的《绥服纪略》、俞正燮（1775-1840年）的《俄罗斯佐领考》和《俄罗斯事辑》、张穆（1805-1849年）的《俄罗斯事补辑》、林则徐（1785-1850年）的《俄罗斯国总记》等对俄罗斯地理、风俗和政情做了部分记载和叙述。在何秋涛之后又有梁启超（1873-1929年）的《俄国大彼得改制考》，其研究已颇具学术性了。

“文化史”（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sup>①</sup>的“复兴”，“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或 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的“凸现”是处于社会急剧时期的当代俄罗斯学术界的两大亮点。<sup>②</sup>其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问题视角的基础是“文明史观”，这种学术现象既是 19 世纪俄国古典文明史观的复兴，也是学术界对急剧转型中俄罗斯社会环境和冷战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际环境的一种回应。

俄罗斯学者沙波瓦洛夫在当代俄罗斯第一本高等学校教科书《俄罗斯学》的前言中提出一系列具体问题：“你们的是传统是什么？你们的根在哪里？你们在哪里生活？怎样获得食物？怎样管理国家？怎样解决棘手的权力和自由问题？如何划分民族集团和社会阶层？如何对待深刻的、自古即有众多问题？你们从生到死一生的路标如何转换？你们是如何相爱、结婚、生育和抚育自己的孩子的？你们是如何工作、欢乐和体现自己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创造精神的？为保护文明免于衰落采取了什么样的联系和组织原则？你们崇拜什么样的上帝？什么样的信仰影响您并给您以力量？你们承认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信念在驱使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影响您的生活？什么样的幻想和神话激励着你们？什么样的威胁使你们无助？什么能给你们以战斗的勇气？什么样的混乱现象使你们恐惧懈怠？什么样的共同感觉使你们联合为一个整体？”<sup>[1](3)</sup>

在俄罗斯已三次再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的作者、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娃在该书序言中也曾强调：“本教科书的任务是给出俄国历史道路的完整观点，从文明角度展现不同社会水平的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清楚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历史资料运用于比较分析之中，将俄国史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历史做以比较。文明史观原则的目的在于：确定俄罗斯在世界人类共同体中的历史地位，理解它与不同民族经验相比较时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特点；给予国家在自己复杂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完整的概念，给予在巨大的人文和自然潜力背景下国家发展的困难和灾难原因的以文明的解释；指明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选择，揭示围绕历史选择问题的斗争冲突，揭示某种力量在它或那样的历史瞬间获得胜利的原因。”<sup>[2](4-5)</sup>

法国学者玛尔莱娜·拉吕埃勒对此种学术现象的评价是：“文化学标志着向世界开放，但同样被认为是一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科学，肩负着重新赋予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反思以历史价值和意义的任务。”<sup>[3]</sup>

因此，“它山之石”——俄罗斯的学科转型，值得中国学术界予以足够的重视。

笔者于 2004 年在四川外语学院召开的“第七届中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讨会”关于建立中国俄罗斯学的发言引起一些同志的注意，<sup>③</sup>其实李明滨先生和白春仁先生早在 10 年前就已经多次发出了呼吁。并且中国的俄罗斯学已经结出了果实。李明滨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吴泽霖教授、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在俄国汉学史和中俄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的贡献<sup>④</sup>，黑龙江大学的金亚娜教授等学者从东正教文化和意识的角度对俄罗斯文学影响的研究<sup>⑤</sup>，四川外语学院的朱达秋教授等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sup>⑥</sup>，首都师范大学的林精华教授对俄罗斯国民性和民族主义方面的研究<sup>⑦</sup>。由李英男先生领衔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专业

<sup>①</sup>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社会史（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sup>②</sup> 笔者有专文论述，参见：张建华：《从文化史到文化学：文明史观的复兴还是重建？——对俄罗斯学术热点现象的评析》载《学术与探索》2007 年第 2 期。

<sup>③</sup>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赵爱国教授提出：“从事俄罗斯历史研究的北师大张建华教授已正式向俄语界发出同样的倡议。”见：赵爱国：《理想模式、个性模式和过渡模式——也谈俄语专业的学科改造与教学改革》载《中国俄语教学》2005 年第 2 期。

<sup>④</sup> 代表作分别为李明滨：《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吴泽霖：《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sup>⑤</sup> 代表作为金亚娜：《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sup>⑥</sup> 代表作为朱达秋、周力：《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 2004 年版。

<sup>⑦</sup> 代表作林精华：《误读俄罗斯：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俄国因素》，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民族主义的意

已经培养出三届具备“俄罗斯学”学科特点的博士研究生和更多的硕士研究生。<sup>①</sup>

同时，俄语学界的语言学、文化学、翻译学和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俄罗斯史学和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之中。有越来越多的俄语专业毕业的学生考取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例如，北京师范大学自20世纪50年代就有着深厚的俄罗斯语言文化方面教学和研究传统，在俄罗斯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教育和艺术专业的研究和上述方向的研究生培养方面居国内前列。自2000年始，上述专业的教师自发组成了一个跨学科和培养方向的“沙龙”，打通专业界限，不定期地组织小型的研讨会，交换研究生课程和推荐具备较高俄语基础和专业素质的研究生人选。6年来，这个“沙龙”不仅增加了教师之间的学术联系和促进，而且扩大了所指导的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并且在此基础上已经成功地设立了“俄罗斯文化研究中心”（设在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俄罗斯问题研究中心”（设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和“世界历史研究中心”（设在历史学院）。“沙龙”成员还在《俄罗斯文艺》（2005年第1期）上以“圆桌会议”的形式从各自学科角度撰文讨论“东方与西方：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问题，同行反应颇佳。2006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由张百春教授主持的“首届俄罗斯文化国际研讨会”，各国与会学者以跨学科的视野讨论了俄罗斯文化（包括俄罗斯学）的众多核心问题。

## 二、中国俄罗斯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即指模式、模型、范例，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作以科学阐述。他认为由从事相近学科领域的研究，拥有同一学术目标的学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community of science)所共同认识和坚持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乃至规则模型即是“范式”，经过“学术共同体”的努力最终形成由此“规范学科”(normal science)，范式既是学科成熟的本质标志。

跨学科的运行和新学科的形成，大致经历五个阶段：跨学科共识——多学科共存——多向多元多层渗透——新范式初建——规范学科形成。

或者可以理解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认识角度意义上的跨学科；第二阶段：方法论意义上的跨学科；第三阶段：结构性意义上的跨学科。

中国俄罗斯学即是一个尚未建立“规范学科”和“范式”的新兴学科，它的“学术共同体”也尚处于集结之中。

关于中国俄罗斯学的学科定位：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的、多元化的、开放型的和宏观视野的学科。相比较而言，传统学科如俄罗斯语言学、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历史学和俄罗斯哲学是微观的和单一性的学科，它们构成了俄罗斯学的基础。

关于中国俄罗斯学的理论体系：它以文明史观为基本理论体系，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注重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和文化类型的比较。

关于中国俄罗斯学的研究方法：博采和综合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之长，文化史的视野和文化学的方法即是上述学科的最优结合点。

关于中国俄罗斯学的研究内容：它应该包括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范畴之列。前者为“俄罗斯学”(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专注于历时态和长时段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如俄罗斯民族起源、俄罗斯民族国家演进、俄罗斯与东西方关系、俄罗斯文化传统、俄罗斯东正教与宗教文化、俄罗斯历史发展特点、俄罗斯文学典型文本和典型形象、俄国和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和特点等，类似于国外汉学的“经典汉学”(Sinology)。后者为“俄国学”(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专注于

---

义与悖论：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转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想像俄罗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sup>①</sup>题目为郭晓丽：《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起源及其文化语义内涵》(2004届)、李小桃：《俄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研究》(2005届)、杨秀杰：《语言文化学的观念范畴研究——俄罗斯“自由”观念析例》(2006届)。

共时态和现当代特征问题的研究，如斯大林体制和斯大林主义、苏维埃政治和社会文化、苏联民族问题、苏联经济增长和停滞、转型时期的苏联和俄罗斯以及涉及当前俄罗斯经济、社会、外交、法律、安全、环境、能源和教育等问题，类似于国外汉学的“中国学”（Chinese study）。前者更为宏观，后者较为微观。

### 三、作为中国俄罗斯学本土资源的中国史学传统

中国俄罗斯学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必须借助于来自中国学术传统中优秀的本土资源，将其“内化”为自信稳重的心态和有效可操作的技能，对自俄罗斯的“俄罗斯学”和西方“俄罗斯学”辐射而来的各种信息加以自觉的过滤、消化他甄别，对“俄风西雨”择善而从，而不是一味偏信或一味孤妄，坚持自己的学术思路和独立见解，从而形成中国语境下的“俄罗斯学”。

中国学术传统即为“国学”传统，即古人所划分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若按照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概念来理解，则“义理”、“考据”与“辞章”三学，分别对应的是“哲学”、“史学”与“文学”，大体属于今人所谓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范畴，而数千年来蔚为大观的“文”“史”“哲”恰好构成了中国俄罗斯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资治通鉴”“经世致用”“明道、求真、经世”“治史明变”“秉笔直书”“史德：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等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为中国俄罗斯学提供了极其丰厚、润物潜滋的本土资源。

在这里我们仅从史学与文学关系的角度谈一谈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作用。历史学研究方法与文学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历史学基本是历时性的研究过程，文学基本是共时性的研究过程；历史学研究主要依靠资料甄别，文学研究主要依靠文本选择；历史学研究多从历史现象入手，文学研究多从典型形象。但是，在两者间仍然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和影响。

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史学家和诗人的差别不在于用散文，后者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成韵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须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sup>[4](28-29)</sup>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对中国历史发展和历史学发展产生极其重大影响的通史。但是谁能说它不是一部逞世扬名的文学巨著呢？《汉书·司马迁传》评价司马迁的史学品德在于“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历史学家的最高赞誉，也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而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sup>[5](201)</sup>被誉为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成就的最高褒奖。其实，鲁迅本人的作品也即是文史并举的典范，他不仅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文学史著作，而且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即是文史结合的伟大作品。

在俄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文名并举的伟大著作，成书于12世纪的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和同样成书于12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都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被誉为当代俄罗斯国学大师的利哈乔夫认为：“俄罗斯文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喜好文献’，喜好事务性散文体裁。文献始终是编年史的组成部分。……这也给编年史的风格打下了烙印：重要性使编年史的叙述变得更为华丽和崇高。”<sup>[6](246)</sup> 19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批判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尾声”的第二部完全是一部标准的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宏文，托翁有关“历史是一门研究各民族和人类生活的学科。然而，

人们却不能直接地去探索，并通过语言文字详尽说明——不仅描述人类的生活，而且尽述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sup>[7](465-466)</sup>他的论断是对历史学和文学关系的最好概述。

“良史”，即为“美文”；“信史”，亦称“华章”。史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直接的承继关系，文学是具像化的历史，史学是抽象化的文学。19世纪俄国思想史与俄罗斯文学高度重合，相互印证，“多余的人”“忏悔的贵族”“新人”“美妇人”“奥勃洛莫夫性格”完全是同时期俄国思想史中的“恰达耶夫们”“巴枯宁们”“赫尔岑们”“涅恰耶夫们”“普列汉诺夫们”的真实和形象的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史学大会特设议题“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史学地位在变化”即代表了当代国际史学界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重视。因此，中国史学传统和当代中国史学家应该并且能够为中俄史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 参考文献：

- [1] Шаповалов В.Ф.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M].изд.ФАИР-ПРЕСС.М.,2001.
- [2] Семенникова Л.И. *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M].изд.КУРСИВ.Брянск,1996.
- [3] 玛尔莱娜·拉吕埃勒.文化学——俄罗斯新的“老套思想”[J], 陆象淦译, 第欧根尼, 2005年第1期。
- [4] 亚里士多德:《诗学》[M], 陈中梅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 [5] 鲁迅:《鲁迅全集》[Z], 第9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6] 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M], 吴晓都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7]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M], 盛震江等译, 下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 In the view of history: A strategic thought on chinese russology

**Abstract:**With the integration of subjects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academic platform--russology now has been accepted by chinese scholars of russian language,literature,history,philosophy, economy and politics.But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chinese russology is lack of “norm” and “paradigm”,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still in concentration.Experiences from the history with long tradition should serve as the richest native sources of russian study of China.

**Key words:**chinese russology,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China,academic paradigm,academic community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